

辛|勤|笔|耕 传|播|火|种

胡 永 钦

(中共马恩列斯编译局)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年了。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缅怀这位伟人对人类的解放事业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留给人类的理论遗产卷帙浩繁。一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已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远离中国的欧洲,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极端落后,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大约五十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及其著作才开始零星地传入中国。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直到一九二〇年,也就是在《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后的七十二年,才被全文译介到中国来。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学说。它的传播是同人民革命形势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革命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而斗争的发展又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主要著作在全国解放以前基本上都有了中译本。今天,这些译本虽然大都已经绝版,已被新的译本所取代;存留下来的已成为各个图书馆的珍本,不再流传,但是,它们在革命斗争中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和提高人民的觉悟、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为翻译、出版和传播这些译本而付出辛勤劳动的老一辈革命者的业绩永远留在人们记忆里。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回顾一下老一辈翻译家在艰难困苦岁月里,始终不渝地坚持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片断,对于我们也是有意义的。

二十年代,五四运动后第二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光辉著作《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诞生了。它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陈望道翻译的。陈望道早年思想激进,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结识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先驱河上肇等人,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阅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受到过启蒙。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回国,旋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积极参加浙江一师风潮,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于是他便离校回到故乡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隐蔽起来,专心攻读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译者的条件异常艰苦。为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不得不躲藏在一间破旧不堪、四面漏风的柴屋里,初春季节,寒风阵阵、冻得手脚发麻。屋内设备简陋,光线昏暗。译者只能在一盏小小的油灯下研读翻译,夜以继日。《共产党宣言》内容丰富、文字精炼而优美,要译得好是极不容易的。而译者当时既缺乏工具书又没有必要的参考资料可查阅,其困难之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译者不畏艰苦,不怕寒冷,从英文参照日文“费了平生译书的五倍工夫”苦译了几个月就译完了全书。

《共产党宣言》是译者应上海《星期评论》之约而翻译的,原准备在《星期评论》上发表。当译者携带译稿来到上海的时候,恰逢《星期评论》宣告停刊。出版《共产党宣言》一事也随之落空,不得不另找出路。这时正值陈独秀等人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时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译者陈望道也参加了这些活动,并把《共产党宣言》

的译稿交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设法出版。但当时出版这样的书是要担风险甚至问罪的，一时难以找到敢于承印的书局。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直接关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资助下，办起了一所小型印刷所。这样，这部光辉的著作终于在一九二〇年八月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名义，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之一出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由于《共产党宣言》“极其透彻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学说”，正切合当时探求真理的仁人志士；特别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要求，所以《共产党宣言》一出版，立即受到热忱欢迎，当年八月间初版，九月又再版一次，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全国各地不断复印，广为传播。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仅一颗火种已燎原于中国的大地，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代革命的先驱，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准备。

三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反动势力更加猖獗，国民党反动派在向革命根据地进军“围剿”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又对革命文化进行了大规模“围剿”。环境更加险恶了。翻译和出版一向被列为禁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困难更大了。然而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介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渴望光明的广大读者又读到了《反杜林论》、《资本论》、《哲学的贫困》等等的中译本。

恩格斯的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反杜林论》是在三十年代初与读者见面的。译者是吴黎平。译者早年向往革命、追求真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对于研究和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曾结

合学习翻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同张闻天合译过《法兰西内战》，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无法铅印出版，只油印流传。那时，译者就有了翻译《反杜林论》的意愿。回国后，一面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一面撰译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三〇年初，因受王明的打击，而失掉了工作，生活艰苦，处境艰难。但是，吴黎平同志没有退缩，继续设法为革命工作。

《反杜林论》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开始的。当时译者白天要以伪装的身份在一所大学代一点课，挣得一点工资，解决一点生活之困难；夜晚要进行支部规定的活动。《反杜林论》的翻译只能在空余时间进行。大家知道，《反杜林论》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它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各个方面；文字比较深奥，特别是杜林的话更是诘屈聱牙，翻译起来是相当困难，要花费很大气力的。况且，当时正值酷热季节，译者又是在上海的一个小小的亭子间里译书，有时还得提防国民党特务的袭击，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就这样，译者日夜拼搏，坚持不懈，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译完了全书，实现了早年的意愿。译稿由当时进步的江南书店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出版。该书出版不久，译者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而他译的《反杜林论》却很快流传开来，并且不断翻印再版，传播各地，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同志有一部《反杜林论》的中译本，常年携带在身边反复研读，在艰苦的长征途中，也不舍丢弃。他不论是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延安都曾同该书的译者探讨过书中的理论问题。《矛盾论》一文中引用《反杜林论》的两段话也是取之这个译本。译者由于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出于革命者的责任感，在延安时期，利用工作之余对全书

译文又作了校订，并由解放社出版。

在战争年代，延安的解放社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出版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仿吾、徐冰合译的《共产党宣言》、柯柏年译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何锡麟译的《〈资本论〉提纲》、曹汀译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吴黎平除了重新校订《反杜林论》以外，还同张闻天译校《法兰西内战》、同柯柏年合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等著作，在延安从事翻译校订工作与在国民党统治区时的情况完全不同。这里有党中央的直接关怀，有专门的组织机构，还为译校工作提供许多方便，然而译书也不是没有困难，最困难的是各种工具书和图书参考资料十分缺乏，有的译者甚至连一本象样的外文辞典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译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要作出多么大的努力，花费多少心血是不难想见的。

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三卷全译本于三十年代末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出版了，这对中国人民来说的确是一件大事。然而，它的翻译和出版却是艰难曲折的。多少年来，立志要把《资本论》译成中文献给中国人民的不乏其人。一九二四年郭沫若曾有过翻译《资本论》的宏意，并作了五年译完全书的计划，但是因为没有出版单位敢于接受而作罢。后来，受到过李大钊的关怀和启示而决心献身于《资本论》翻译的侯补庐于一九二八年在法国开始了这项工作，也是在这一年，另一对志趣相投的年轻人郭大力和王亚南在杭州古刹寺内也共同立下了翻译此书的誓言。这个时候和这以后，从事翻译的还有陈启修、潘冬舟和吴半农、千家驹等人。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艰辛的经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译完出版了三大卷《资本论》的是郭大力和王亚南。他们为此花费了十年岁月，可谓含辛茹苦。

马克思这部宏伟著作，博大精深，文笔优美、逻辑严密，要译完译好它，决非易事，郭大力最初在翻译《资本论》第一卷过程中，困难重重，深感要译好非有丰富的经济学知识、理论和中外文修养以及翻译经验是难以做到的。于是两位译者开始学习、研究和译介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名著，如亚当·斯密的《同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许多著作。经过几年潜心研究和翻译经济著作之后，他们又重新投入《资本论》的翻译工作。

几年前在西湖畔译好的第一卷译稿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炮火烧毁，不得不从头译起。两位远离家乡的年轻人，没有固定的职业，缺少生活来源。他们只有一面写些文章、翻译些著作换得稿费来维持生活，一面分头攻译《资本论》。第一卷译完之后，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进了上海，战火中断了他们翻译工作，郭大力一家返回江西老家，王亚南离开上海去内地。在战乱中的艰苦条件下，过着游离不定清贫生活，分散两地继续坚持翻译工作，《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译稿就是在这样险恶条件下诞生的。

《资本论》三卷的翻译和出版可以说是在党组织的直接帮助下得以实现的。当时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没有一个印书局敢于冒然应允出版。当译者开始翻译而又找不到地方出版时，党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签订了出版合同。为了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每月定期给译者一定的生活费用，即使郭大力回到家乡翻译第二、三卷时也未间断。读书出版社为了尽快出书，还就经费、印厂和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如敌人的阻挠和迫害等都作了妥善安排，读书出版社在重庆的总店还派了专人来上海协助，郭大力从江西来上海参加译稿付排和校对工作。这样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一股作气出齐了三大卷

《资本论》。它的出版无疑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资本论》不断印行，广泛传播。

全国解放前夕，实践出版社又首次出版了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新中国成立后，郭大力仍然致力于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再次校订了《资本论》的译文，甚至身患重病也从未停歇，直到革命的最后时刻。译者为翻译《资本论》，为传播马克思

主义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贡献自己一生的全部精力，实在令人敬佩。

总之，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们不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辛勤笔耕，传播火种，出版了相当数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们在翻译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兢兢业业、坚持不懈的献身精神是感人至深的，对于我们仍有很大的教育作用。

从不反抗历史发展规律

先生的一生，反抗过很多东西，但是从不反抗历史发展的规律。他对我们说：别的都可以不怕，可是历史前进的车轮，决不要去阻挡，它是阻挡不了的。谁要阻挡，谁就会被碾死。坚决站在进步的方面、革命的方面、人民的方面、科学的方面，这是先生一生为人和做学问的一个最基本的立场。

“三新”和“三勤”

先生从事语文学术研究工作的特点，有“三新”和“三勤”。“三新”是立场、观点、方法的“新”。

“三勤”是搜集材料、做笔记、思考的“勤”。先生的书有的要比原书厚一倍多，多出的部分就是他的笔记。

摘自《春风夏雨四十年》

倪海曙忆陈望道